

供批判用

Nº 0002247

关于杨德政、康岩中、杨世才、袁昌福
等人召开反革命应变会的部分材料

中共贵州省委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三月

按语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决策和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对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真正的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而“四人帮”在我省的黑爪牙杨德政、康岩中、杨世才、袁昌福、赵福岭、张甦等人，对此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的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的消息一传到我省，他们惊恐万状，如丧考妣。这帮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多次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革命应变，妄图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坚持“四人帮”的反革命立场，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诬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狂叫要打到北京去“救出”“四人帮”；他们密谋夺取枪支，打开监狱，组织和训练流氓、阿飞，炸毁邮电通讯，破坏桥梁，断绝交通，搞反革命武装暴乱；并策划把一些所谓的“勇敢分子”组成“小分队”在城市搞“掏窝”，进行暗杀我党政军负责人的反革命恐怖活动；同时，还妄图把人、枪拖上山，抢劫国家银行、粮库，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无产阶级对抗到底，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丧心病狂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痴心妄想。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人民群众一起来，他们的反革命迷梦

就迅速地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杨德政、康岩中、杨世才、袁昌福、赵福岭、张甦等人覆灭前的疯狂表演，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这些家伙，过去曾无耻地标榜他们是什么“造反派战士”、“反潮流英雄”、“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文化大革命洪流中泛起的沉渣，是极右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这些年来，他们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面内战，搞打砸抢；到处插手，制造事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干尽了坏事。他们这些年来的历史，就是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罪恶历史。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在这场触目惊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面前，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对“四人帮”插手我省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地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当东郭先生。如果那样，就会留下祸根，后患无穷。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那些跟着“四人帮”搞了阴谋活动，办了不少坏事的人，只有把参与搞阴谋活动的那一套，老老实实地、完全彻底地向党和人民讲清楚，才是唯一的出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甚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

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参与了“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只要把问题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是欢迎的。

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他们在我省的黑干将、黑爪牙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有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负隅顽抗；有的还存有幻想，至今不揭发，不交代；有的还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要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穷追猛打，把反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贵州省委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杨德政、康岩中召集的反革命应变会

时间：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晚七点半到九点钟。

地点：市××局××科×××家。

参加人员：杨德政；康岩中、张应保、杨世才、（下略）。

×××七七年元月一日交代：

会议内容：一、议论形势，二、我们的打算。

杨德政说：看来这个情况是真的了。

康岩中说：据说组织力量反扑结果全部被扫光。

张应保说：妈的，政变了，右派翻天了。

杨德政说：右派翻天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他们把江青都搞掉了，这点是肯定不得人心的，王洪文是主席在十大提起来的副主席，他们真敢干。看来四个人是在和他争主席，被干掉了。以后我们的情况就不可想象了。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冲杀一下，主席不在世了，我们咋个办？第一、大的镇压是肯定会出现的，这次那就是要掉脑袋的事。第二、一旦出现镇压我们咋个办？从中央的情况看，现在可能在做善后工作。首先是要先把上面的打扫干净。然后再扫下面挖基础，目前还不可能搞下来。压，这是肯定的。从贵州的情况来看，这些走资派这回要借中央搞“四人帮”来搞我们。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挂了号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啦，每次都是受错误路线整的对象，这次更是跑不脱。

搞了我们，但要压一片，最后还是我们。我们不能侥幸，如果

一旦出现了大的镇压我们怎么办？你们想过没有？还象原先那样写一写大字报，大标语，哄一下行不行？

康岩中说：这回是掉脑袋的事，肯定是不行的了。

杨德政说：因此，我们首先是把工人队伍组织起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落实，原先要你们立足在本单位，这次你们该看到了吧。因此，只有首先把群众团结起来。

康岩中说：我看这回硬是要撤到农村，重新来一次革命。

杨德政说：真正的打起来，我们在这里肯定是呆不住了，就要往农村转移，在农村扎根，把农民发动起来。

康岩中说：原先那种哄一哄，闹一闹，冲一冲已经不行了，这回是真枪实弹的干了。

张应保说：右派翻天，我们只有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你不组织、不发动，不搞武装，光拿脑袋去碰，找死。世才，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形势要从最坏的地方着想，到时候才不会乱，心中才有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改变了颜色，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只有干到底，才有我们的出路。

杨世才说：我已在做各方面的群众工作，我认为各方面都要准备好，我们是信仰马列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左派。因此，我们要把马列主义大旗扛起来，要为真理而斗争。

康岩中说：搞修正主义没有好下场，肯定是不会长久的，主席逝世后，就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时吼得凶，没有用，要在这关键时候看一个人的表现，只要革命胜利，我愿当个垫脚石。但我们不能无故的牺牲，我们要搞马列主义就要想办法保存下来，他们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夫人搞掉了，这对主席是什么态度，主席刚逝世，他们就这样干，这

能说明他们是搞马列主义的？我们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而斗争。

杨世才说：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真正的成为一支马列主义的队伍，为全人类而奋斗，揭露那些搞复辟、搞倒退、搞修正主义。我现在有个想法，把各方面的部队都组织起来，文的式的都要。

杨德政说：你们俩都在（指我和杨世才）你们想办法把工人队伍组织好，把群众队伍组织好，把真正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看来，×××这股力量还出不来，但还是要靠我们去组织，应保想法把××的工人组织起来，冶金的几个大厂矿要抓起来，×××厂叫×××去抓，建委要×××和小×（×××），煤炭要×××去发动，财贸的要×××和×××。但是主要的重点是工建交这个口，只要先把这几个重点厂矿抓死，真正的骨干力量有多少，能拉出来的有多少？自己心中有个数，只要真正把工人抓住，那就好了。专州的力量现在暂不管他，到时候，会自己来的。现在就是武装怎么搞？枪支的来源。这些你们自己都应该去考虑。

杨世才说：枪支已经有八十多支，而且这个武装部长是我们的铁杆（指××公司）装备个把连不成问题，只要有上个把连，还是打得起来。现在还要继续摸。我看铁路上还有一股力量，可以拉得出千把人。

杨德政说：铁路也应该抓住，这是个最关键的，打起来，我们怎么撤，往铁路上撤，跟着铁路跑，又灵活又机动，拉得出，开得动。

杨世才说：我认为你（指杨德政）和老康（康岩中）从现在起隐蔽起来，老红军（×××）他们把他咬了？他是老红军，又没有啥问题不会怎么样。主要是你们两个隐蔽起来，不要露面了，到时

候，队伍拉出去再设法找你们，和你们取得联系，会后的联系叫×××和你们联系，因为他在×××工作可以搞侦察，我们走了以后，在城里面要留人下来搞地下工作的，暗暗地摸情况，摸复辟分子的动向，到时候，跳得凶的，突然进城派敢死队和暗杀队宰了他们。

张应保说：就象土改时那样枪毙恶霸地主还乡团。

杨世才说：我认为×××这里完全可以做一个秘密联络点。可以隐蔽下来。

杨德政点头说：老×这里是可行的。

杨世才说：还可以解决一点后勤问题，你们老同志现在把钱粮都要准备好。

康岩中说：这些我们知道。

杨世才说：以后伤病员都可以送到这里来住。

×××说：没有问题，你们来，出问题算我的。

杨世才说：应保应该考虑我们如何布置，方向性的东西拿出来。小×（×××）和×××叫他们带部队，组织队伍打仗。×××把流阿强组织起来，他又可以开车，运输可以搞，还可以暗杀，用流阿强搞。小×（指我）去搞敢死队，冲锋陷阵没问题。×××到时候带走，做个随身参谋。×××搞通讯联络，无线电装置好，能联系上，他还能写。最近有情况就往×××家和×××家走。你们两个老同志摸一摸上层，把上层的工作做一做，主要是需要情报，情报准确就可以制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杨德政说：我们一个是要寻找军队支持，有部队支持就好办，一个是设法和搞民兵的拉一拉关系，这都要靠去做工作。真正打起来，往铁路沿线走也是一个办法，往农村撤也是一个办法，一个

上山打游击。贵州这个山区好得很，愿怎么打就怎么打。

康岩中说：整个贵州到处都可以跑，我看重点是农村。

张应保说：就是以往那样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到了农村，吃不成问题，只是生活艰苦点。

杨世才说：我们认为应该把两个大知识分子工作做一做（指×××、×××）把×××勾住。

张应保说：这些我知道。

杨世才说：罗锡康也准备组织工人队伍，准备把工人民兵抓起来。

杨德政说：太好了。

杨世才说：×××和罗锡康是合作的。

张应保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造反派重在团结。

杨世才说：肯定要团结的，现在看来各个力量都在酝酿准备，只要大家都紧张起来就好了。现在设法给几个老同志都通知一下，想办法隐蔽起来，我们少接触。

杨德政说：老×可以。要他和×××联系，我们就不接触了。

张应保说：现在我和世才去×××、×××那里一下，把情况摸摸。

杨德政说：可以嘛。并嘱咐我们，今天议论的这些可不能往外传。

张应保补充一句：千万不能在外面乱冲，特别是世才和小×要注意，嘴要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百次工作做得好，只要有一次出屁漏，前功尽弃。

杨世才说：说了自己倒霉。

出来时，张应保说：真的右派翻天了，老子宁愿站着死，不愿

跪着生。

张应保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交代：

五点半离开九化，六点过钟回到×××家。我和杨德政在×××(家)吃晚饭。晚上八点左右，康岩中、杨世才、×××相继赶到。×××把我们五个安排在他家一个套间的里间内。我们的反动应变会开始进行。先由康岩中、杨世才、×××介绍他们十四日晚上回贵阳后所了解的情况。康岩中说：××已经动起来了，××、××已经表态支持，我从铁路上得到的情况，说上海开出的列车已经中断。杨世才说：关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抓的消息，和昨天晚上给你们讲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是被抓了，袁昌福(他)们在开始搞枪，准备上山打游击，袁昌福已经搞得了两支枪，一是五四式手枪，一支是公安手枪，我亲眼看到了。×××也说：袁昌福(他)们确实在搞枪，准备上山打游击，已经搞得了两支，其中一支是由×××帮他背。接着我们议论了怎么办？×××说：不要老是犹犹豫豫的啦，事情已经很明显，方向盘已经向右打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拿出该怎么办的办法来，杨政委(按：指杨德政)现在是你当机立断下决心的时候啦。×××主张立即组织群众，设法武装群众准备斗。杨世才的意见是组织群众斗，准备上山打游击。×××也主张组织群众斗，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说：我同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从最坏处着眼，一方面给基层干部打招呼，叫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单位，即造反派实力比较雄厚的单位，做好动员组织工作，至于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我认为在贵州不具备条件，交通四通八达，造反派力量薄弱，并且处于无权地位，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得住吗？因此，我主张看看外省

形势发展，那里举旗，就往那里投靠，有条件时，再回来收拾。××说：我不同意你（张应保）的想法，只想到头头往外面跑，不顾群众，这是右倾逃跑，就是（主张）立即设法武装群众，准备上山打游击，至于枪嘛，搞武装一个连的枪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杨德政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作好最坏的打算，注意掌握情况，大家分头做做工作，干部方面的、民兵方面的等，杨世才、××负责做工人方面的工作，康岩中负责做政法系统的工作，××负责做贵阳市的工作。张应保负责回××做××的工作，杨德政负责做领导干部和部队方面的工作。

二、杨世才召集的反革命应变会

1. 第一次反革命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下午两过点到五点过在省××公司××家召开。

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代：

会议一开始，杨世才说：“听说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起来了，不可能吧。”

赵福岭说：“肯定是真的，北京抓了四个人，乱成一锅粥，从此，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诸侯割据，谁也管不了谁。”这四个人在中央没有抓住兵权，力量那么强都被干掉了。搞掉这四个人，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从此，中国全面复辟，无产阶级政权落到修正主

义手里，中国从此变修，右派翻天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杨世才说：“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这些人搞复辟倒退，我们就是掉脑袋也要和这些复辟分子血战到底。”

赵福岭说：“上海、××、辽宁的造反派力量是强的，他们肯定征服不了，也不会就此罢休。”

我说：“我是没有军队，如果有军队打上北京去，把他们四个人救出来。”

杨世才说：“现在我们着重是要把武装搞起来，没武装，象原先那样哄几下，是要被人家干掉的。有了武装，小×就组织敢死队。”

我说：“剩下我最后一个人也要干到底。”

××说：“这次我们不可能让他们抓住，抓住了可不得了，我们每人身准备一包毒药，到时候自己毒死算了。”

杨世才说：“武装嘛！我们贵钢可以拉出一个排。”

我说：“一个排没有，一个班还可以。”

杨世才问：“老×，你们那里的武器准备得怎么样？”

××说：“没有问题，部长是我们的人，绝对可靠，到时候拿出来就行了。”

杨世才问：“有多少枪支？”

××说：“冲锋枪，有四十来支，还有一些步枪，有七八十支。”

我说：“光有几支枪有什么用？”

赵福岭说：“够了，兵不在多，只在精。”

杨世才说：“到时候，我们这个小范围的人全部拉走，编成班、排、连，只有一个连，打起来还是很厉害的，我们这里面文

的、武的都要组织好，公开了，就拉上山，不公开就在贵州山城，暗暗地组织地下游击队，只要把铁路一中断，他们的外援进不来，光我们和这些复辟势力打，他们是打不赢我们的，如果公开的拉上山以后，城里面也要暗暗地组织一支队伍，搞暗杀，破坏。没有钱了，到时候抢银行，搞得他不安宁，如果全部公开了，就把这些跳得凶的各单位的走资派暗暗干掉，搞乱了以后再走。”

赵福岭说：“就象李向阳的游击队一样，进城了，骚乱一下又走。”

杨世才说：“现在你们都要把各单位跳得凶的记下来，到时候干掉他。”

赵福岭说：“从此中国全面复辟，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重上井冈山，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四人主要没有武装，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搞武装，现在先组织好，到时候，红旗一举上井冈山。”

杨世才说：“我看这里面文的，赵福岭、×××，如果张应保要来也算一个。组织队伍，×××、×××。组织暗杀队伍×××、小×（我），×××是消防队来的，搞侦察可以，×××没有暴露，留在城里潜伏下来，作一个秘密联络员。×××作战参谋部的。我（杨指他本人）当然全面负责。”（这个分工情况，杨世才给我单独也谈过。）

赵福岭说：“我们要靠武装才能得到政权，象原先那样哄几下已经过时了，这回硬是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建立农村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年的恶霸地主，要进行镇压，打开粮库，发动群众。”
这时，已经四点钟了，×××才来。

杨世才说：“老赵把刚才大家议论的情况再给×××讲一遍。”

赵福岭说：“复辟势力走资派向我们开刀，镇压这是肯定了的，现在硬是要拿出上山的劲头来。”

杨世才作了撤退选点的讲话，说：“打起来，我们就往两个地方走，一个是黔东南的月亮山，这里很偏僻，听说山里还有土匪，（他是听黔东南跑来贵阳躲避的×××讲的）如果打起来就往这里撤；还有一个是广西的十万大山，打起来也可以往这里撤，这个山大，好打游击。先把这两个点选好，打起来就上山，先把根扎下来。”

赵福岭说：“我看最好往两省交界的地方撤，谁也管不了谁。到时候如果有军队暴发，我们就去汇合，有其他地方举起红旗，我们就去汇师。”

杨世才说：“我们要把马列主义的大旗重新举起来，我们要成立一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马列的小组，慢慢扩大我们的队伍。”

赵福岭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现在起，我们要筹备粮钱，把自己的亲属都安置好。从武装、弹药、人员枪支，能拉走的多少，都要作好准备。”

×××说：“公司准备要我送一个退休老工人回安徽，我想借此机会出差，借五百块钱来放着，人不出差，先把钱放在身上，如有情况就立即走。”

×××说：“能借尽量多借一点。”

赵福岭说：“能在各单位借的，都尽量以各种名义多借点，把钱粮准备好，放在身上，如有情况立即带走。”

杨世才又说：“看来，真正的马列主义大旗还只有我们这里来举起，老子们成立一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队伍。”

杨世才又对我说：“真正的打起来，文的都没有用了，主要是武的，到时候，你就是敢死队的队长。”

我说：“冲锋陷阵看我的了。”
×××说：“今天的情况谁也不准往外面说，谁说出去，我们是有纪律的，要惩罚。”

赵福岭说：“开玩笑，这能说出去？要杀头的事情。”我说：“谁说出去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

杨世才说：“现在不收拾你，到时候有人收拾你。”

杨世才规定了联络的地点。说：“我看，现在×瞎子这里没暴露，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有情况往这里集中。”

×××说：“来这里问题不大，一般我这里没有什么人来。”

杨世才说：“老×那里（指×××）也算一个点，有情况就往这里集中，把枪拿着就走。最近几天瞎子和小×腿勤一点，多跑下，几个老者那里，经常取得联系，因为你们两个有单车。”
杨最后说：“杨团长（杨本人原是李再含八一八兵团团长）的宏伟计划一定要实现。”

杨世才的宏伟计划就是×××家策划向北京来的（特务）记者汇报的那一套想当省委书记的阴谋计划。

在这个会上每个人对杨世才、赵福岭的讲话和部署都是乐意接受的。没有一个提反对意见，我的表态也是很坚决的。大家同样有一个闻过鱼死网破的决心。×××和赵福岭的态度都是说，如果被他们抓住，还不如这样干，死去痛快。

赵福岭还说：“我们这里面都有被抓的可能，现在要设法组织几套人马，杨世才被抓，或牺牲了怎么办？由谁顶上。”

杨世才说：“×瞎子和小×顶上。”

×××说：“除开小×不会被抓以外，其余在座的人都跑不脱。”

杨世才说：“小×作为我们留在城里的秘密联络员。”

×××说：“以后我就住在小×家。”

这个会以后，杨世才还是采取单个串联的方法给小范围以外的一些人讲（如××、×××、×××、×××、×××）。

×××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代：

当我到×××家时，发现外室大门关着。经敲后，是×的爱人来开的，我进屋后发现第二道门仍然关着，×的爱人依然站在外面。我推开第二道门后，发现房内烟雾尘尘，窗户紧闭，个个脸色紧张，使我大为吃惊。

杨世才说：“你来晚了听老赵给你讲。”

赵福岭说：“现在有可靠消息证实，外面都广播了。中央已发生反革命政变。”

赵福岭又说：“最近，××区、×××、××去北京，肯定与政变有关。”“这次镇压的行动，肯定很快，×××、××他们一回来，就要动手，这次抓人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批地抓，成百上千地抓。”“不过，中国是不会平静的。”

杨世才说：“搞不好全国大乱，部队都要打起来。”

×××说：“各省都有造反派，部队也是两派，一乱起来那最好办。”

杨世才狂吠：“我们要有这个气魄，到北京去把江青他们救出来。”“现在我们怎么办？”

×××狂叫：“老子们上山打游击。”

杨世才又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集中到一个地方，说不好听，就是相当于当年的井冈山，我们也得取个组织名称。”这时，有的提出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军”，有的提出叫“贵州造反派革命军。”

×××说：“杨世才是我们的司令。”

赵福岭说：“我们还要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支部搞起来，杨世才就是书记。”

杨世才说：“对！把党组织建立起来，我们要建立马列主义的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

我问：“人集中起来，住在那里？”
赵福岭说：“只要我们能坚持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红色根据地肯定会出现，那时候我们就投奔红色根据地。”

杨世才说：×××会开车，×××会开车，到时候，你们这些文人坐车先走，跟张老臭（指张应保）商量一下，看他走不走，要走也把他带上。”

×××说：“重点保司令，司令要先走。”
×××说：“走的人不能太多，要组织一些不怕死的，最多几十个人就够了。”

×××说：“与其给他们杀死，不如到外面去死。”

赵福岭说：“危险性最大的先走，危险性小的可以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

杨世才说：“×××没有暴露，看来问题不大，可以留下来。×××也可以不走，他的目标不大。”

×××说：“不，×××可以跟到去搞些宣传工作。”

我说：“最好能与上海取得联系，看看上海的情况如何？”

杨世才说：“×××家在上海，他可以到上海去取得联系。”

×××说：“我有个公差去安徽，要路过上海，可以去摸些情况，下周我就走。”

×××说：“来不及了，先把武器搞到手，必要时，把监狱都打开，这儿些都是亡命徒，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到时候，美帝、苏修、台湾一下都打起来，才热闹，对我们更有利。”

×××说：“对，把武器搞到手，老子们这里玩枪的人有的是，我们还可以把一些转哥组织起来。”

杨世才说：“武器，省××公司有一些，我们贵钢也有，还有×××也可以搞，安顺、遵义都搞得到。”

×××说：“我们的武装部长是我们的人，没有问题，已经说好了的，到用的时候就取，现在是封好了的，任何人都动不了。”

×××说：“我明天到遵义去联系（指武器）。”

我说：“关键是部队有没有我们的人。”

杨世才说：“有，×××××、×××××、×××都有我们的人，××市××局是支持造反派的。”“××（地区）我负责去联系。”

×××说：“××（地区）我负责去联系。”

赵福岭说：“老杨，你不能走，另外派人去。”

杨世才说：“×××去，将就与×××（××地区××局的干部）取得联系。”

×××说：“这个我办得到。”

在讨论上山时，×××提出：“我们每人身上准备一包毒药，我给你们准备好，实在不行了，就一起服毒，但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白地死，拼命也得干他们一批。”

×××说：“当然不能白死，那有这样的便宜？我们走之前就干一些摆起。”

杨世才说：“走的人先走，留下少数人在后面，一个晚上统一行动，干了摆在大街上，你们看他们怕不怕？”

赵福岭说：“这就是惩办胡汉山的办法。”

×××说：“干，还不能用枪干，只能用刀。我有一个办法，装成查户口的，把门一敲，一开门就冲进去，干了就走。分几路同时进行，包干负责，一晚上干光，万一被发现，就当场自杀。”“关键时刻要高度集权，权就集中在司令手里。”

杨世才说：“行，看要干那些，报个名单给我。”

我说：“今天的会太危险，一旦有人暴露，我们大家完蛋。”

×××说：“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如果那个泄露，我们大家都否认账。”

赵福岭说：“我们要执行纪律，不是断腿就是断臂。”

×××说：“断腿、断臂到时候我们是要干人的。”

我说：“我建议今后不再开会了，有什么事由杨世才派人通知。”

赵福岭说：“以后，三个人以上都不能在一起接触，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交谈。”

×××说：“对，两人说话死无对证。”

杨世才说：“今后的联系办法，还是按原来定的三个点，一个是×××家，负责赵福岭、×××、×××三人，由×××负责联系；一个是×××家，由×××负责联系；一个是×××家，负责油榨街片和×××，由×××负责联系。×××、×××每天下午六点钟都要到×××那里，有什么事好联系。”杨世才还说：“他

自己住的地方不是×××家，就是×××家，有什么事就在这两个地方找。”

赵福岭最后说：“只要听到×××、××他们回贵阳的消息，就要马上转移。”

×××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和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代：

在我家，赵福岭说：“中央出事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抓起来了，……这次是右派搞政变。”“这些都是秀才造反的软弱性，只知道研究，为什么不先动手呢？看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要重新开始，这样的时间就长了，将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变成四分五裂，林彪的那一伙肯定要投靠苏修，军阀割据就要形成，到那时互不卖账。”

×××说：“贵钢有一个排的民兵枪支，我有把握。”

×××说：“我们公司民兵我调得动。”

杨世才讲先躲起来再说。

×××说：“要跑就往铜仁的一个大山去。”

杨世才说：“到农村最保险，最好到贵州和广西交界的地方，将来以农村包围城市。”

×××说：“到大山怎样联系。”

杨世才指×××说：“他是搞无线电的。”

×××说：“不成问题，只要一架收音机改装就行了。”

×××说：“我们也不能这样被他们捉去。”

赵福岭说：“要走也不能放过这些复辟分子，统统把这些复辟分子干掉，你单位干我单位，我单位干你单位的。”

×××说：“不能被他们抓住，要准备一瓶毒药，抓住就吃毒

药死了算。”

2. 第二次反革命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在省××公司×××家召开

参加人员：（略）

×××十二月二十四日交代：

会议由杨世才主持，赵福岭主讲。会议时间不长，但气氛十分紧张。主要内容：（1）赵福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2）武装暴乱夺权；（3）组织暗杀；（4）明确分散和部署撤退地点。

赵福岭说：“贵州的复辟势力走资派，他们高兴得很，会借×去搞‘四人帮’来对我们镇压，左派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将被处于被镇压的地位。这一次的镇压是很厉害的，主席在世，他们不敢搞，主席刚去世，他们就来这一手。”

杨世才说：“现在老×要把武器准备好，到时候拉得出来。”

赵福岭说：“现在情况不明，肯定要镇压，决定分散隐蔽一段时间，就在贵阳附近，摸情况，真正大规模地镇压的时候，就撤到两省交界的地方，现在我和老×决定去上海，把情况摸清。”

杨世才说：“老×走后，找谁？你要交待一个铁杆。”

×××说：“就直接找×××。有事找他，武器一拿就走。”

赵福岭说：“杨世才、小×（指我）、小×绝不能在一起，要分散，不要象他们四个人那样被一网打尽了，他们四个人如果跑出来一个那就热闹了。你们如果一个人被抓，还有两个顶着干。”

杨世才说：“他们四个为什么不干呢？应该退到上海打起来，把这些复辟势力搞光。”

赵福岭说要×××在××公司打个证明写×××等三人。

×××说：“老赵要改名（叫“王石”）。先把钱借出来到上海，把那两个甩掉，咱们摸咱们的情况。”

×××主动的要杨世才和他躲在一个亲戚家，杨世才要我去遵义，×××去安顺，×××留在贵阳，说他目标不大。

赵福岭说：“现在还不到真正撤退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一个是复辟势力走资派进行大规模地镇压的时候，一个是那个地方举起红旗来的时候，我们就干，投奔那里。”

杨世才说：“现在要把地点选好，一个安顺、一个遵义。×瞎子去安顺，找×××，他会找地方转移的，听说，他们要到省×××来领枪，我设法要他搞几支。”（我说：各常委配备一支。指在座的人。）

赵福岭说：“现在我们选点要选在农村，只有在农村才能扎根生存，象杨世才讲的那两点只作为我们暂时避一避藏身，真正的打起来在两省交界的农村，深山建立根据地，现在我们撤在贵阳附近，摸情况，主要摸省委的态度和走资派的动向，如果目前没有大规模的镇压的迹象，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回来就赶快组织发动，首先是要把武装部队组织好，到时候才能拉得出来，而且要编好班、排、连。我们要成为一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队伍。”

杨世才说：“去上海的主要摸情况，去遵义和安顺的，主要选点，如果安全，就住在这两个地方避。×××在家经常和×××联系，可用×给你送一送信，暗暗地作为我们一个通讯员。注意走资派的动向，把各单位跳得凶的搜集起来，暗暗地收拾，比方说，冶金局的×××，半夜突然进他家，要他交出省委镇压计划，交不出就干掉他。”

赵福岭说：“我们要作好被抓的思想准备，如果杨世才被抓，

就由×××和小×顶上。我被抓，由×××代替我。不要抓了一个把我们这支队伍搞垮了。”

杨世才说：“×××留下来，你要把×××抓住，这个人有些点子，遇事多和他商量。另外，和几个老者那里取得联系，密切注意城里的动向、变化。×××搞通讯联络，把收发报机、电台装好，到时候拉走。”

×××说：“我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拿一台收音机一改装就行了。”

杨世才说：“×××组织流阿强队伍，利用流阿强去把这些跳得凶的走资派干掉。”

×××说：“我认识几个，但不行，一干就要把我全部暴露。”

杨世才说：“你要先把人选好，改造他们，要找流阿强队伍改造得比较正规又死硬的人。还可以找小×单个吹一次，利用他一下。”“××搞后勤，准备钱粮，到时候，打开粮仓，就有粮，打开银行就有钱。”

他指着自己说：“我杨团长就是到处游说，发动群众，老赵把理论搞一搞，经常提出一些方向路线问题，把大家的理论提高。”

赵福岭说：“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任何风浪都不怕。”

杨世才说：“乱世当中出英雄，我们宏伟计划一定要实现，向着宏伟目标前进，我们回来的那一天，贵州就是我们的。我们这支队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队伍，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和那些搞修正主义的斗争到底。”

赵福岭说：“现在我们一切行动由×××指挥，让×××来安排和指挥我们，把摸到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多久回来，多久集

中，都听×××的，我们现在分散是为了将来的集中，还不到真正分散和撤退的时候。”赵福岭还说：“谁暴露了这次会，谁就是叛徒，衡量叛徒的标准就是这个。”

我说：“按司令官的老规矩，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

杨世才说：“以后知道了是谁讲的，要剃头。”

(这次会后，×××去安顺，赵福岭、×××去遵义活动去了。)

×××补充说明：

在×××家开会时，还规定了联络的暗号，我当时间：“我们分散出去或回来，怎么知道被抓或没有被抓，怎么找人？×××又怎么知道我们回不回来，出事没出事，怎么联系？”

×××说：“各人家门上搞个暗号，我一看就知道了。”

赵福岭说：“就象铁梅在窗户上贴个蝴蝶那样。”

×××说：“我的窗户糊白纸。”

×××说：“我的窗户、门上挂一个红布或扫把，乱搞一样东西都行。”

我说：“这些暗号各人自己搞，反正门上挂东西都行，都证明出事了。”

杨世才说：“没挂东西，就平安无事。”

杨世才要同×××找×××作为一个暗暗的通讯员，利用他送下信。×××不是属于小范围内的人，因此，不能参加小范围的会议。”

杨世才说：“进小范围的人要具备条件：(1) 坚强。(2) 顾大局。(3) 通商量。(4) 保密。(5) 思想要见得面。要具备这五个条件才能进核心，谁提出人进来，要通过核心讨论，经杨世

才同意。”

杨世才说：“这是我们反潮流的光荣传统，不这样干，反潮流搞不起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代：

杨世才在会上说：“我们也只有拼命干，要不是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这些人都被绑上了战车，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我们现在必须积极组织力量，各单位都要心中有底。另外，一定要设法搞枪。”

杨世才问×××：“你们武装部的枪怎么样？”

×××说：“不到关键时刻不能动。”

赵福岭说：“现在是对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一个严峻考验。大家不要害怕镇压，镇压也是好事，不镇压怎么会有反抗呢？但是，在历史上凡是叛徒都没有好下场的。”

×××说：“镇压，老子先干掉个把，那儿些就慌了。”

×××说：“谁镇压造反派最凶，就干掉谁。”

赵福岭说：“暗杀，嘿嘿！×××、×××这样的走资派干掉两个，形势就不一样，复辟分子就会乱套。组织几个精悍的，神不知鬼不觉地专搞暗杀。”

×××说：“暗杀队我算一个，搞别的我不行。”

杨世才说：“×××你把社会上的那一伙好好组织一下，到时候叫他们出面干。”

×××说：“我们这些人都被绑上了历史的战车，谁也下不来了，只有拼到底，只要我有枪，拼一个算一个。”

赵福岭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组织力量，人不要多，要选拔骨

干，要精。”

杨世才说：“形势很不好，镇压一定到来，我们要有准备。现在先避一避，看看形势，把消息摸准，特别是省委的情况要摸准。”

杨世才叫×××到“老头子”（杨德政、×老红军、康岩中），还有什么“秘书”那里经常跑跑，摸情况。叫×××到遵义联系一下，（×××曾说，遵义是他开辟的基地。）叫×××到安顺把情况弄准（杨曾说，×××局也有他们的人）。

×××自告奋勇地说：“老杨可以到我二娘家去避几天。”

杨世才叫×××赶紧把手续办好，和小×一道去上海。

赵福岭说：“今后单线联系，我们的地址都只告诉×××，避多久都听×××安排。”

（第二天，×××、×××、赵福岭都按时去避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代：

在我家开会时，杨世才说：“修正主义上台，我们肯定要被镇压，我们这些人不会放过手的。×××们那边敢干，他来找我几次，他们来人联系过。我们只有同修正主义拼，我们要搞枪，老×你们单位的枪能不能拿出来？”我回答说：“要问×××。”杨世才说：“你明天去找他谈下。”

赵福岭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些人变成了推进历史前进的羔羊。也要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才能锻炼出人来，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这次必然要大暴露，但凡是历史上的叛徒，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这些修正主义会把他们四个人说得一塌糊涂的。特别是江青，他们还会搞人身攻击。”

×××说：“我们要相信自己干的是革命，不要怕。”

×××说：“老复辟恨透了我们，我这条命不要了，同他们拼。”

赵福岭说：“×××、×××、×××三个可以不走。×××负责搞联络通信，把通信地址给你，没有走的人你要经常联系。贵阳××团有一个姓×的，我给一个条子，你要化名去找他，他的上层人物很多，那点可以得到消息。以单线联系。以后这样的会再不要开了。最好的办法是单线联系。”

3.第三次反革命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在省××公司汽车队×××家召开

参加人员：（略）

×××十二月二十三日交代：

杨世才又提出镇压一定会到来，要×××继续把武装部的枪搞准到时候拿出来，也提出要×××把社会上的一伙打架犯组织好。

杨世才说：“镇压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出现，如果走资派要镇压，就杀他个把，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说：“对，就是这样干。”

杨世才说：“我们要保持几个人经常碰碰头，交换一下意见，谁摸到什么情况，就互相转告一声，我经常也到各家去跑下，×××还是经常跑跑，打听一下，杨德政、康岩中那里也要经常去看下。”

×××说：“小×要多注意形势。”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代：

杨世才说：“我们这些造反派，他们上台当然要镇压我们，肯

定要抓。康岩中告诉我很快要抓人，叫大家躲一下。老×你单位的情况怎样？”

我说：“领导叫我安心工作，有错要认识。”

杨世才叫我找我单位爱打架的人跟着搞。我说：“我同这些人不来往。”杨说：“试试看吧。”

杨又问，你单位的枪怎样？现在行不行？我说：“不行。”

杨世才叫×××还是到城里去，了解一下情况。

4.第四次反革命会议于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在省××公司×××家召开

参加人员：（略）

×××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交代：

十月二十五日在×××家开会

十月十七日杨世才、赵福岭决定分散撤退后，我于十八日回到遵义，二十二日回到贵阳。回贵阳后，杨世才给我说：你走后，我们在×××家研究了一次，以后我（杨世才指他本人）和老赵（赵福岭）单个谈。老赵本人的意见不接触其他人，只和我单独谈。我想了一下，今后的圈子要缩小，形势好了再扩大，准备组织五个人在一起吹牛，不开原先小范围的会了，就是我单个和其他人去串，这五个人肯定有你一个（指我）。有人说你不看书不读报毫无理论水平，是个冲菜苔，不同意你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敢冲敢杀，不投降。我给他们说，只有小×能代表我，大家不吭声了。我对杨世才十分感激，认为他在关键时刻帮我讲话，我说：有我脑袋在，也就有你杨世才在。杨世才说：这五个人有你、我（杨世才）、×××、×××、×××，准备星期一在×××家吹一下。于十月二

十五日晚上，杨世才召集了我，×××、×××、×××在×××家开会，当晚下小雨，我和杨世才走路先到×××家，只有×××一个人在家。×××骑单车后来，×××进门就说有事耽搁了，连饭都没有吃赶来参加开会，要×××给他煮饭吃。大家等×××，时间近八点半了，×××还没有来。杨世才说：不等了，开始了，以后我也不喊他了，这个人爱撒谎，是个流氓无产者。办事不认真。会议时间从八点半左右开始到十点多钟结束，主要内容，杨世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马列，×××分析形势，会议一开始，杨世才说：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对我们镇压的威胁不大。当然下面这些人巴不得抓我们。象我们这些事(是)挂了号的，要经省委同意，省委不同意还是不会被抓的。×××接着说：将来我们撤退就要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斗走资派就要象斗当年的地主一样，我们到农村去一个解决我们的衣食住问题，可以避难，生存下来，另一个就是发动群众，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斗走资派，农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就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开粮仓，分田分地，建立根据地。老杨，我建议你，现在要作社会调查，一个群众领袖，不了解点情况是不行的。老杨现在你应该先选择点，找一个县的农村，先去到那里，了解情况，把根扎下来。杨世才说：我有能力，有信心，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如果遇到老子那怕上台掌权两天下台也甘心情愿，老子掌权，不象这些复辟势力走资派那样，不执行主席的，我们的斗争是共产党内部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是信仰马列的，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下次如果有反复，我们要和这些斗，就再也不能象原先那样哄几下就完了。我们要干，从现在起，就要组织好，以后就不再打造反派的旗号，也不打什么反潮流的旗号了，就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马列，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因此，我们

的任务是在中国推翻修正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在这个世纪和下个世纪永远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前进，大家如果同意就这样干，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来。×××说：非这样子干不可，既然老杨提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定下来。×××说：怕卵，干就干嘛。我说：大家都干，我也不怕。杨世才说：如果大家都愿意干，那就行，怎么搞法暂时大家都酝酿。绝对不能往外讲，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能讲，因为有些人受不了，你给他讲，起副作用。并且要×××找下赵老臭(赵福岭)商量下，把理性的东西搞出来。从现在起，我就要把真正干革命的人找拢来，象建立党支部一样来建立造反派的核心，我们就是党支部，他们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我们自己承认，四人帮没有出息，遇到我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象那四个人那样，把基地先建好，把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统统安排一些到中央，如果要打就硬打。他们只抓上海，混账，(杨世才是后悔四人帮没有抓他，没当上官)结果一打就垮。现在虽然搞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们还是要干呀，我们已经被绑上了战车，下了车啦！我要为真理而斗争，一个人就是要讲点真理，不象台上那些复辟分子，我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质上中国现在已经变修了，因此，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左派，我们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的来建立造反派的核心。以后我们这里就是中心支部，我想叫×瞎子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协助他。×××说：老杨不要扯谈，那些人都不如你。杨世才说：现在干起来的，以后形势好了就是真正的核心，有些人等形势好了再来不要。(我们三个人在当时都认为形势一定有反复，所以只要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是真的核心了。)现在我们不要动，暗暗地搞，只要抓不到辫子，他们还是无法，要开展地下活动，注意观察，如果谁行，要培

养，培养到一定的时候，能接受我们的观点，就要他来，如果不能接受，就不要轻易乱吹，乱吹要出事。搞起来，我们这里就是中心支部，其它的地方都要听从这里的安排、指挥。专州的，安顺一个支部、遵义一个支部，暂时只考虑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强，又是红派的，安顺和遵义暂时只酝酿。作为今后发动扩大的对象。先把贵阳的搞起来，贵阳的分片、分系统都行，如果搞不起来，先从油榨片区搞起，贵阳市的叫×××去搞。我硬是要这样干，不这样干不行，如果不搞一个坚强的核心，不经打，遇到形势对我们不利大家都躲边边，如果有利都想出来称老大，不行。并且要×××和赵福岭把理论搞一搞。（杨世才给我单独谈主要是要他们两个把国家、政党、领袖的理论阐述出来，拿出纲领性的东西来，提高到理性上来认识）我、杨本人到处游说，暗暗发动，靠我的演讲来发动群众。两个小×把情况摸一摸，×××叫他把流阿强利用起来，组织流阿强队伍去打、搞暗杀，反正抓到了，我们也不会暴露，只要不暴露我们都行。吩咐完毕后杨世才说：小×目前搞通讯联络，因为你目标不大，又有单车，多跑一下，通知一下人，可以把小×利用起来和你们一起跑，小×（指我）你要学会和上层人物打交道，如象贵钢的×××，你要去多接触和魔鬼都要交朋友，你怕什么，只要为我们的路线服务，接触以后你才能知道上层的情况，才了解。因此，你把上层的事情搞一搞。（杨世才的两次分工都是自相矛盾的，他自己主意都拿不定）只要真正的这样干下去，我们还是有前途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左派，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杨世才的言下之意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修正主义的，杨世才现在组织人搞是为了推翻修正主义，建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杨世才的语言虽然含糊，但他的

野心阴谋是大的，反革命用意是十分恶毒的。

我们三个人都接受杨世才的观点，而且×××还是主讲，我和×××都表示同意杨世才这样干。议论了这些完后，×××要吃饭了，×××桌子上放得有酒，我喊拿酒来喝，杨世才还学着南腔北调地说：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大家都哈哈大笑干杯。吃完后，×××骑着单车先走，我和杨世才走路回贵钢。在回来的路上，杨世才给我说：不这样干不行，我现在不这样抓搞不起来，我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我们现在要暗暗发动，以坚强的造反派为基础，慢慢地选，真正干的，那以后就是核心，不干的，形势好了再出来，不要。还是你小×最聪明，比×瞎子都行，这个“副官”还只有你才能争当，其他人不行，想争也争不上。不过我们这边党员多，我先准备找××、张应保、×瞎子吹一吹，看下他们的态度，不过干这些人是肯定愿干的。××是个老实人，不多讲话，还可以，×瞎子是个奴才，也可以，张应保胆小一些，×××、×××都可以，慢慢的来。不这样搞不行，人家一压就把我们压垮了。我说：这回就看司令官的本事了。杨世才说：杨团长没有点本事，两个老臭（张应保、赵福岭）会听我的？我说：老赵怎么样？杨世才说：没问题，他是吃屎的狗，断不了那条路。杨世才说：把贵阳的先搞起来，分片也行，分系统也行。一个系统就是一个支部。象冶金，要×××去钩住×××，就搞起来了。交通就找××，建委就要去找×××和×××，×××和×××有矛盾，只要把×××勾住，就行了，煤炭就找×××，商业就是×××和×××，虽然他俩有矛盾，只要我在当中调配，要×瞎子把×××钩住。有些人胆小怕事，只要你经常灌输，去影响他，让他自己来上钩，只要一上钩了他们就下不去不了啦，把他们推出来，要挨也只能挨他本人。你象×××如

何？积极、顽固、有理论又能写，我选的人没错。原先不行只要一培养就行了。象这些人只要死死的钩住他，跳都跳不脱，包括你小×在内，原先不怎么，通过这段时间锻炼，水平大大提高了，现在叫你投降你也不会去投降了。因此，人选问题慢慢地来，有些人要引他们上钩，如果都不行，先从油榨片区搞起，油榨片区是个解放区。李再含时期，我杨团长在油榨片区，四派不敢来，我杨团长就是这样出名的，就从我们这里搞起。现在我要凭我威望去发动群众，暗暗地单个串。因为你们去不行，老总不相信，有些人对你们信不过。好了我的整个全盘想法都给你交底了。只要真正的这样干，我们还是有前途的，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杨世才还说：现在我们要把调子比街上那些唱得还高一点。抓革命促生产。在单位好歹不开腔，就是你在我头上拉屎、拉尿都不吭声，把你记下来，找人暗暗地收拾，我已给×××讲了，通过流阿强去搞，如果收拾不了，等过了这个风头，下次就不象原先那样斗一斗、批一批就算了，下次就要剃头。小×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大炮，大炮容易暴露。要拿出搞地下工作那一套出来。单线联系，今后就是我个人和一些人单线串，绕过这个暗礁我们就是胜利。

（在会上，×××说：我们都不是党员。杨世才说：唉呀！我都可以批准介绍你们是党员）。

×××十二月二十三日交代：

杨世才在会上提出说：“赵福岭是个微妙人物，他和上面肯定有线，他很危险，我们要保护他，我催他回天津，他同意，明天就走。我准备把老战友召集一下，一人凑点钱。”

×××说：“要镇压，我们先干掉两个。”

杨世才说：“镇压会一定来到，但目前还不会。现在我们要隐蔽起来，少量人经常通消息，摸摸情况，我觉得我们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小组，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说：“我们都不是党员，不要搞什么。”

×××说：“我们早就是党员，比那些复辟分子的党员要硬多了。”

×××说：“老子早就够党员条件了。”

杨世才说：“造反派是没有履行手续，早就够党员资格了。大家先考虑一下，我和其他同志再商量后说。”

5.第五次反革命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厂）×××家召开

参加人员：（略）

×××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交代：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杨世才召集了我和×××、×××、×××、×××、×××在××厂×老头家开会。八点过钟，我刚吃完晚饭，×××就来喊我到×老头家开会。我去时，杨世才、×××、×××、×××已在座了。×××没有来，因为开始通知×××家，后来不知怎么又到×老头家。×××在×××家等杨世才要×××去看一下。×××来后，会议从八点半钟开始，快十点钟结束。会议一开始，杨世才说：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的镇压要开始了，从公安部门传出来，要抓我，主要有三点：1.写周总理大字报；2.捆警卫战士；3.冲击会议。我看第一点我没有，纯属造谣。捆警卫战士有，主要是警卫战士先打人，冲击各种会议，省委不落实政策，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冲击。运动又不是我自己要搞，中央号召的，但对

于我来说，总是不抓我这样就要抓我那样，反正要整你一下，因此，我准备避一下。据说有个山东经验，发的是21号文件，传达到省军级，层层设专案，这就厉害了，这就说明层层要揪代理人，这个面就宽了。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镇压的局面要出现，因此，我们要利用矛盾，保存下来，绕过暗礁，胜利在望。要学习林彪，把军队搞起来，搞了大大小小舰队，把军权掌握得牢牢的。还要把林彪搞暗杀的那一套学会。因此，我们还是要坚信我们是信仰马列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一个人要为真理而斗争。只要我们坚持下来拖过去，顶多半年，使我们慢慢的变成历史，只要我们成为历史了，就不怕了，因此，以后还是要干的，按我们制定的方针办（就是在十月十三日在×××家开会，十月十七日在×××家开会，十月二十五日在×××家开会的那一套），我要为真理而斗争，老婆孩子根本不考虑，死了也心甘情愿。×××说：我来发表点谬论，据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人们思想中追求的是什么？是自由、民主、幸福，那里还象我们这样，作无为（谓）的牺牲，而且相当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什么民主，有什么自由？我们造反派事实上是“四人帮”的御林军。他们几个需要的时候，就拼命宣扬什么路线呀、主义呀，我们为什么，还不是为他们少数几个人，因此，不能再受愚弄了，不干了。你看现在有什么自由，还提心吊胆怕被抓，更谈不上自由，有什么幸福？连生活都一餐想一餐的办法，谈得上什么幸福。而这些当权派+走资派，却小车出，小车进，应有尽有。这时，×××就跳起来了，要干要干，讲那么一大套理论干什么，现在就是省公安厅的要抓杨世才，先把（公安局）×××抓来审问清楚再说，干他一顿，要不然大家散伙，说完起身就走。我当场就说：那能这样干呢？现在是什么时候

了，还这样干，是人家抓我们的时候了，还干人家。×××也说：太不象话，这样搞不行的。杨世才就接着说：怎么办？我不想走。我说：既然康岩中都已说了，情况肯定是真的，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听老康的意见避一下再说，要躲过这个高潮，老康说的情况肯定是准确的。杨世才说：往那里躲，只有先躲到遵义去，安顺不能去。我问×××，我说，老×你们不是说原先有枪吗？现在能不能拿出来，或借一支短枪出来，我送老杨走。×××说：枪已全部封存。杨世才说：如果有枪，我和他们拼了。×××说，拼了不行，现在先保存下来。杨世才接着说：现在就决定我和小×先走，在座的老×和×××你们经常在一起商量，有什么事情多找老恩联系，以后，小×多跑一下，因为他目标不太大，这段时间也熟悉了一些情况，老×再待一待，我们有什么情况会来信告诉你们。小×说：来信就写××厂我（或）张明收，一般不会查可以收得到。杨世才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写一张大字报，就是我今天下午给×××说的内容，小×去找××的×××贴一下，小×说×××不会干，杨说：不干，你就天亮前骑单车贴了就跑。你们几个人要团结，坚持斗，大镇压一开始，就隐蔽，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的左派，你们就是战斗核心，整个斗争，就由你们指挥。你们要开展暗暗的活动，要形成一个力量，说得不好听点，我们就是信仰马列，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左派力量，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马列，要形成一个革命组织，不要象社会团体那样，不要象搞帮会那样，要发挥作用。×××说：老杨，你放心走，有些事我们会干，主要是你要保存下来，不要被抓住。小×说：老杨放心去，有些事情我们会干的，家里不用耽心，有时间，我叫张明去你家照看一下。×××说：老杨主要是把自己保存下来，你一被抓，大家都

完了。因此，千方百计保存下来。

当晚，大家走后，第二天早上，杨世才给我说：我弟昨晚到张明那里去摸情况来，张明说：省委没有研究，象抓他们，省委要研究的，现在只抓了水泥厂两个人和朱德义，没有说抓你哥他们，下面说的，你让他们说去。杨世才又决定不走了，象吃了颗定心丸一样。后来又说决定去一下遵义，把老赵接回来，让他回天津。二十五号去，二十六号回贵阳。当晚就碰上抓杨世才，杨世才、赵福岭当晚就走路到阳关躲在×××家。

×××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代：

在××厂老工人×××家开会，主要内容（1）准备成立所谓“马列主义小组”；（2）准备配合×××搞暴动；（3）决定拿我们单位的枪；（4）传播政治谣言。

杨世才说：“×××要成立‘马列主义小组’，大家有意见没有？”×××表示同意。

杨世才又说：“×××他们那里已经组织好力量要干，他们准备炸铁路。炸铁路，他们确实敢干，我很赞成，我的意见是同他们共同干，死了就算。”

×××说：“反正都是死，那我们得大干一场。我们（的）纪律，哪个暴露了，不断脚要断手。”

×××说：“要干就痛快的干，我们把邮电大楼炸掉。”

杨世才问：“你们的枪能不能拿出来？”我说：“枪封存了。”

三、袁昌福召集的反革命应变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袁昌福等人在×××家召开了一次反革命会议。参加这次反革命会议的有袁昌福、张甦、（以下人员略）

（一）袁昌福的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我们从×××等人转告我们的从外台听到北京抓人的情况后，我们感到很恐慌，我们不敢相信，一边怀疑，一边打听。

一天下午，张甦来到我家。我说：我估计外电报道的情况可能是真的，这几天我们这些人都在打听，这些事，心神不定的。听来的群众讲，他们到×××那里去，×知道这情况后脸都吓白了。张甦说：“老袁，是不是找几个人来碰头扯扯，凑凑大家了解和摸到的情况。”我说：“可以嘛，这几天大家都在摸情况，我的心情也比较乱。你过去给老×讲一声，分头通知一下，还是原来的那几个，明天晚上。”

第二天晚上，到×××家已经九点了。小房子里开着半导体收音机，烟雾很大，房子里坐满了人。有张甦、×××、×××、×××、×××、×××、×××，加上刚进门的顾健和我。我说：“这几天关于北京发生事情的小道消息传说的越来越多了。……可能是真的。外电报道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被捕的消息估计是真的。这一下看来文化大革命完了，文化大革命都否定了，我们这些造反派还算个啥。这几天心情烦乱得很，搞不清楚发

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听说上海很紧张，×××、
×××他们带着几十万民兵顶着干，最近到上海的火车都不通了。”顾健说：“不过北京发生的事情看来是无疑问的，肯定是真的。对江青、王洪文他们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我是不会拿出去乱讲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请大家放心。”张甦说：“老袁，遵义那封信在不在，拿来给大家念念。”我摸出信，就给大家念起来。信的大意是：最近听到不少小道消息，北京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分析，我们很担心下一步全国一铺开，复辟分子就会趁机搞造反派，就会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肯定又要挨整。如果贵阳搞造反派你们呆不住的话，可以到我们遵义来，我们遵义造反派的基础好。我刚念完信，张甦便从我手里把信拿去，烧掉了。张甦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了，担心，还担心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才进政治局的嘛。”我说：“王洪文是全国造反派的头头，把他们搞下去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张甦说：“江青都搞下去了，你这些造反派算个啥，不整你这些造反派整那个？”好几个异口同声的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造反派是真的，是不是都要整造反派那不一定。张甦说：“这一次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这些新生力量搞下去，实际上是带政变性质的，是右的战胜了左的。”×××说：“到底是那些人搞的，一直还搞不清楚。”张甦说：“实际上就是去年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搞右倾翻案风的那几个人嘛。”我说：“是的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批判了他们，当然是不会满意的。”张甦说：“这一下他们要整起来不得了。……从省委常委来看，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又批过他，又和他老婆吵过架……。”我说：“关键还是××

×。”张甦说：“……从贵州的情况来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说冀鲁豫是老复辟就是×××他们说起头的嘛。”顾健说：“×××这次肯定百分之百的跑不脱，在贵阳市揪金风就是他亲自干的嘛。”我说：“我们大家给干部做做工作，给他们把有些问题解释清楚。”张甦说：“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分别给老干部谈谈，一定要给他们把话解释清楚，缓和缓和我们之间的矛盾。”
×××说：“整不整造反派，关键还是省委。”我说：“李再含时期的经验还是要吸取，把高潮躲过了就算了，抓住了，那个坐牢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呢。我宁愿当野人，也不愿去坐牢，人失掉自由比什么都痛苦。”顾健说：“那个要整到老子，老子也会收拾他的。”×××说：“老袁到专州去避避风头，到遵义去怎么样？”我说：“到遵义去干啥，全省搞起来，遵义比贵阳还老火。”张甦说：“讲四派的基础好嘛，还是毕节。”×说：“威宁行不行？”我说：“威宁是高寒地区，冷得很。”×××说：“广西十万大山好。”×××说：“跑到那里去干啥，那不成了土匪。”张甦说：“躲一躲最好不要离开本地，好了解情况，熟人多。”×××又问我：“老袁，你看到底怎么办？”我说：“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看再说。”

(二) 张甦的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家开的黑会。晚上八点钟，我去了×××家，已先到的有×××、×××、×××、×××、×××、×××，到八点半左右袁昌福和顾健一道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和×××来了。我看时间不早了，就对袁昌福说：“是不是没通知来的人，最好不参加”。袁说：“对，没通知的人暂时不参加。”

×××说：“我是碰上的，我走。”×××站起来也要走，我们让他留下了。袁说：“顾健是通知了的，也参加。”

×××走后，我问袁：“是不是就开始吧？”袁说：“就开始吧，你先说说。”我就先说了：“今天中午我去了市一医，医生说罗锡康在吊盐水，我去看了一下，他要死不活的，话都说不出，我就走了。下午我去×××家。我遇到×××，问他，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说：我什么消息也没有听到。他对我说，今天下午×××、×××都回来了，正在开会，什么消息过几天你就知道了。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些。”×××说：“我和小×上午到了×××家，问他这个事情怎样看法，他说中央精神都没传达，叫我怎么表态？我怎么套他，他都不说。我们也去了×××家，×××和×××一个调子。又去了×××家。”

末了，我说：“×××，你把听到的外台消息给大家讲一讲吧！”×××说：“这几天传说的消息，大家都听说了，看来是真实的。昨晚上，我去一个工人家里，亲自听了一下《美国之音》的广播。我亲自听了广播说：把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抓了。外台报道是客观的，比较真实的。”×××讲完后，我说：“大家谈谈对这次事变的认识吧。”我说：“听了这些消息，我心头万分悲痛。这次事变的性质看来是一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政变，看来已经成功了。全国的造反派是彻底失败了。江青、王洪文这些，我想他们被抓的时候，显得多么壮烈啊，接着而来就是一场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中国革命的成果就将付诸东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的篇章，就将宣告结束了。”

有的人发言表示赞成。其余的人大都表示赞成。总之，没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一种极度悲观、凄凉和一种莫明的恐惧气氛，笼罩

罩了大家。

袁昌福说：“这里有一封遵义来信，我先念一下。”（信的内容：“昌福、张甦：北京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这一次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都将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如果贵阳不方便，建议你们到遵义集中。××、××是可靠同志，望你们放心！誓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月十五日。”）他念完后，我拿过来，用打火机烧了。袁昌福说：“我同意信上的分析，这确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次事变的看法，我同意张甦的分析。形势是很严重的，法西斯专政马上就要到来，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说：“听说杨世才他们已准备上山打游击。”袁昌福说：“如果上山打游击，我们准备去那儿？”大家沉默。袁自问自答：“是不是去广西十万大山？十几个人在一起，几十个人在一起，没吃的就下来抢粮食。”我说：“这不是成了土匪？”袁昌福说：“是的嘛，他们就成了土匪嘛。广西十万大山很复杂。”大家都说到十万大山不行。袁昌福说：“是不是去威宁？”我说：“威宁倒是比较好，地形险要，四派力量强，又挨近云南，可以和云南造反派取得联系，必要时可以向云南撤。”袁说：“那我们就去威宁。车子怎么找哇？”×××说：“只要大家决定去威宁，车子还不好找！交通局车子多的是。”我说：“去威宁还是有困难，有的老婆孩子一大堆，……”袁说：“那么有困难走不了的就留下，反正贵阳也需要人留下来坚持斗争。”×××说：“大家要我留下，我就留下。”我又问：“去威宁打游击有枪没有？”袁说：“××有四派的民兵，还缺少枪吗？”我说：“××四派没有掌权，有什么民

兵？再说，现在要上山打游击，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你又能动员起几个人？”袁说：“照你这样讲，威宁也去不成了。”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我不同意上山打游击。”袁昌福说：“法西斯镇压马上就要到来了，要不了几天就要大规模抓人了，那时要跑也跑不了哪。”我说：“不会那样。”×××说：“你想得太幼稚了，三五天不会抓人，我看过了一个星期就要大规模抓人了。”我说：“形势不会那样，因为这场政变是突然搞起来的，各地的反革命势力还没有组织好，还要经过一番组织和动员，才能把力量组织起来，才能向革命势力开刀。说马上就是白色恐怖，是不可能的。用什么办法才能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一是要充分利用干部宗派山头之间的矛盾，利用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二是要和冀鲁豫干部和解，……”袁昌福说：“我基本上同意张甦的建议。你们不晓得坐牢是什么滋味？”

我说：“今后如果要进行清理，我想了一下，我们这派有这么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小×、小×今年九月去清华大学，一是一九七四年袁昌福、杨世才我们几个上北京，一是我和杨世才到河南，袁昌福去上海。”×××说：“我提醒大家一下，你们的材料转移了没有？没转移我建议干脆烧了算了。这是几个老同志叫我转告你们的。文化大革命都定了，还留那些材料干什么，将来人家抄去，都还不是罪证。”

这时顾健发言说：“今天大家的看法，我都是同意的。我敢向大家保证，今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出卖大家。……我还有个想法，我们干脆象巴勒斯坦游击队那样组织起来，哪个老复辟要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我们就去把他干掉！”我说：“我坚决反对你这种想法。这是极端的冒险主义，非把革命力量全部报销

不可。”袁昌福说：“我也不同意顾健的这种想法。”
时间快到十点了。我就走了。

（三）××的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以袁昌福、张甦为首，经过他们与×××、杨世才密谋策划之后，一天晚上，在城基路×××家召集了一个反革命的应变黑会。参加这个黑会的人有袁昌福、张甦、×××、×××、顾健、×××、×××等人。会议由晚上八点过钟开到十点过钟。在这个反革命应变黑会上，先是由张甦谈情况，分析形势。张甦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反革命政变”，“是元老派上台，复辟势力上台。”张甦说：（四人帮）“早抓住一部分军权就不致如此了。”四人帮的完蛋“太快了，太突然了。”张甦说：“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人家支红派已经开过会了，杨世才他们开会，杨老头（杨德政）都参加了，他们决定如果形势恶化，就撤到威宁、毕节一带去集中。”袁昌福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并拿出一封“遵义来信”念给大家听。信中内容也提出了“要上山打游击”的反革命应变计划。念完后袁昌福说：“上山打游击，宁愿饿死在山上，也不愿回来挨抓。只要上山打游击的大旗一立起，象水泊梁山一样，就会有人来了，不仅贵州、西南，而且全国都会有人来。到那个时候我这个司令不当了，当个副的就行了。杨世才他们提出的云贵州交界的毕节、威宁一带可以，我看贵州、广西交界的十万大山也可以。搞武装部的枪，搞民兵的枪都行，要利用部队的矛盾做工作，先有一点武器就好办了。”张甦说：“可能要追查七四年六月顾健和×××去北京和罗锡康会谈的事，追查七四年八月昌福、世才、我和赵福岭去北京然后又去河南上海的

事，追查七六年九月×××和×××去北京的事，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该处理的材料就处理了，我的都处理了。”顾健说：“打游击要象巴勒斯坦游击队那样，搞小分队出击，搞恐布活动，要跟踪钓线，对那些整我们的人，抓住之后两斧头把他砍死。打游击要团结社会上的那些打架、摔跤、击拳的人，这些人讲江湖义气，敢干事又亡命。”顾健还提出了“变被动为主动”的反革命主张。他说：“我们四派情况（与）支红派不同，我们一直受压，上面又没有人掌权，有些干部是同情我们的，建议由袁昌福先去找省委内对我们比较好的常委摸底。”对刺探省委情况，所谓摸底的主张，袁昌福当场表示同意。×××说：“我完全同意昌福和张甦的意见，并保证严守秘密不出卖大家。要和昌福在一起，与复辟势力血战到底。上山打游击喊走就走。”×××表示“同意昌福和张甦的意见，到时候搞一部汽车开起跑。”×××和×××都表示“同意昌福、张甦意见。”最后张甦讲了两条决定。张甦说：“我和昌福商量了一下，有这么两个决定：第一就是以后不再集中几个人以上的会议，以后转入地下活动，单线联系；第二，若果谁知道特殊情况或发生特殊情况，要立即通知昌福或我。”

开这个反革命应变黑会时，会议中是十分紧张、胆颤心惊的，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用塑料窗布遮上，房门也关得紧紧地，叫×××的孩子在房外一间侧房间放哨。在开会过程中张甦还多次喊大家“小声点、小声点。”神情十分紧张。一直到开完会离开时都是呈现出紧张惶恐的气氛。

（四）×××的交代：

四人帮反党集团揪出来后，袁昌福、张甦召集我们在×××家

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张甦、×××、×××、×××、×××、我、×××、袁昌福。

张甦说：北京出了事，今天大家来统一一下思想，小×先把情况介绍一下。我就把外台广播、我收听到的一些反动宣传讲给他们听。我说：北京抓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三十多人，……。张甦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变，对这次事件的性质，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说：我同意张甦的看法，是一次成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变。我们到会的都表了态，都是同意张甦的意见的。张甦说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谈一谈。×××说：停止社会上的一切活动，看看一段时间再说。张甦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的翻案了。后来袁昌福拿出一封信来念给我们听，信是写给袁昌福、张甦的，信上说：北京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不行就上山搞武装斗争。袁昌福念完信就把信烧了。袁昌福说：现在上海到处在抓人，我们贵州肯定也要抓，我们在座的谁也跑不脱。坐牢的日子是不好受的。×××说：昌福和张甦到外面去躲一躲。×××说：我们也出去躲一躲。袁昌福说：现在是全国都在搞，你往那里跑，人家杨世才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行就拉上山打游击。×××说：那我们也上山打游击。我也说：上山打游击。×××说：到广西十万大山。×××说：那里复杂得很。我说：还是到威宁，那边气候不好，交通不便，躲得住，就是生活苦点。袁昌福说：你们看过枫树湾的电影了吗？那个长根说，山上再苦也比山下强。威宁那边我们有人，他们掌握民兵，条件好，不行就到威宁。又问如果真的要走，小×有没有把握搞到汽车。我说：到汽车三场乱开一部就是。张甦说：我们说走就走，人家拖儿带仔的怎么办？袁昌福说：实在不能走的就留下，

这里也要留人斗争。张甦说：好了，就这样定了，今后这样的会不开了，有事单独通知。

(五) ×××的交代：

在×××家开会，收音机在广播，窗子是放下帘子的，气氛比较紧张，个个都感到心情不安。

×××讲：“除了中国没有广播以外，凡是外台都进行了广播。江青已下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于会泳，还有很多，三十多人都抓起来了。”张甦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搞掉了，这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搞掉的都是文化革命的革新派。下一步还要清洗，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搞下来，我们四个人到北京去告状，昌福到上海、顾健到北京送材料，都要挨，×××、×××到北京跑不脱，搞不好要审查。情况紧张，对我们革新派非常不利，看来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袁昌福说：“形势非常紧张，对我们不利，大家看怎么办？”袁昌福从怀里摸出一封信，内容是，北京出现了重大事件，江青、王洪文被抓，形势紧迫，时间紧张，请你们速来遵义集中，上山打游击。信念完后，张甦拿火把信烧掉。袁昌福说：“思想上准备一下，回家去把粮准备好，把钱准备好。”×××说：“威宁方向最好，地势高、山林大，又是三省交界地方，打游击最好的地方，那边少数民族，又有造反派的基础，全国的造反派一起来，我们就可以打回贵阳来。”袁昌福说：“威宁、六盘水那边地势高，森林大，要是躲在里面鬼都找不到一个。”我说：“十万大山地势险要，打游击是好地方。”

(六) ×××的揭发交代：

张甦坐在靠近袁昌福的小床上，右边靠书架，他说：“今晚的会不能长了，把下步的计划给大家讲清楚。”说着，便把他一个二十四开的红色笔记本拿出来，他的全盘计划和路线图，都准备得很周密。并把去上海方向的，云南方向的，威宁、水城、宣威三县交界处的路线图都告诉了到会的。

张甦说：“我们今晚上的会议有以下几个打算：以后×××、×××你们两个是军官，就是武装连连长，在未拉走前你们两个要完成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坚决想尽办法把通讯联络网给炸掉。就是邮电大楼，首先侦察好，要炸掉重点地方，如电台、收发报机、长途电话台，先通过内部人了解清楚后才能行动。里面有通往中央的长途电话，直接通话的，搞清收发报机的位置，搞清楚后按计划执行任务，不能混乱。要打有准备的仗和有把握的仗，要特别注意，不能麻痹。

第二、对炸掉桥梁的事，确定往那个方向走，去上海方向还是云南方向？同样重点是火车、汽车通往这两处的独桥，也同样要摸清后才下手，决不能炸一些不起作用的就麻烦了。炸药我张甦负责去搞，我是化工系统的××炸药厂是属于我们系统的好办。具体分工，×××负责通讯×××是××系统的，他去了解三个去向的要害桥梁完全可以了解到。

顾健和毛洪礼的任务是了解张××、陈××、朱×的情况，在行动时一定要干掉，决不能手软。过去我们就是手太软了，吃这样大的亏。

×××的任务是临时通知去往的方向，按原来决定的暗号，先

敲三下门，不准喊，人都通知完了以后，由×××和×××把袁昌福的介绍信先头去联系原来我们的人，或袁昌福和外地有联系的造反派头头。”张甦说：“这是绝密的，决不能暴露，谁要暴露了今后全部责任就是谁的。”

最后决定：×××公开留下来，因他家有八口人吃饭，一个人工作。留下来继续活动；×××以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名义留下来指挥，和×××取得联系。×是得有介绍信的，是顾健给的空白函，由×负责临时给×××送给×××行动时带走；×××和我是秘密留下来的，是在两个任务（即炸邮电大楼和桥梁）完不成的情况下，叫×××和我来完成任务后，逃跑时在×××那里去取得联系，由他告诉，把介绍信和联络信号与袁昌福、顾健取得联系。

州的党政大权，并运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公开或秘密的手段，诬陷领导干部，将大批的老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斗争，残酷迫害。为了巩固已掌握的权力，积极策划、指挥、煽动武斗，血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无辜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同时，大搞打、砸、抢、抄、抓，将抓捕的对立面，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进行陷害，甚至搞所谓的群审群判，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制造大批冤假错案。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省开展了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成员在贵州犯下的罪行，从而粉碎了在贵州的帮派体系，逮捕了骨干成员康岩中、孙昌德、徐英年等人。

1978年8月17日，贵州省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4条之规定以及中共中央有关的指示精神，向贵州省高院提起公诉，请求严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反革命、打砸抢分子康岩中。8月21日，贵州省高院经审查后，裁定由贵阳市中级法院审理此案。贵阳市中级法院组织审判力量，及时、认真地进行了审理。经审理查明，康岩中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康岩中，男，49岁，原系贵州省公安局科长。1967年打着“造反”旗号，窃据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67年8月和1968年3月，策划指挥专业武斗队动用专政工具，在贵州工学院、贵阳华家山非法抓捕群众190多人，进行刑讯逼供，并将其中5人逮捕，长期迫害。1968年9月18日，被告人亲自率领600多人，指挥攻打安龙龙广区，下令开枪，造成打死农民9人，逼死2人，重伤致残11人的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7月，被告人又参与策划给武斗队发放枪支，积极鼓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揪斗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并组织“动态组”、“专案组”，大肆搜集整理昆明军区、贵州省军区、兴义军分区及贵州驻军领导人的黑材料，狂妄提出要把某师赶出贵州。

197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被告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后，被告人极为不满，与其同伙阴谋策划，以要挟省委释放帮派同伙为“突破口”，搞乱贵州，控制一些地区和单位，把省委搞瘫痪，逼中共中央表态，改组中共贵州省委，夺取中共贵州省委领导权。为实现这一阴谋，被告人伙同杨德政等，幕后策划指挥帮派同伙张应保、杨世才等人，纠集帮派势力，打着“反潮流”旗号，分别在省委大楼、省军区礼堂等地冲击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地师级干部会，围攻、揪斗领导干部。同年7月至8月，被告又亲自出面指挥，通宵围攻中共贵州省委、省公安局长负责人，甚至围攻生病住院和正在开会的中共贵州省委、安顺地委、省政法办公室负责人，要挟给被逮捕的同伙“平反”。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告人攻击为“右派政变”，叫嚣“现在是真枪实弹干的时候了”，要“重上井岗山，到农村打游击”。为此，被告人伙同

杨德政纠集张应保、杨世才等策划反革命活动，多次了解民兵枪支情况。11月24日，被告人获悉省委将对其帮派同伙采取措施时，即于当晚通知杨世才等人潜逃。26日，被告人销毁罪证，携带手枪一支、子弹46发，冒充乌当区医院保卫干部，化名“凌云志”逃跑。12月2日，被告人窜到清镇县，与“社会主义革命党”反革命预谋暴乱集团首犯赵普明、成员陈茂英相勾结，并躲藏于陈茂英家。同月4日，被告人同赵普明去织金，共谋策划建立和扩大反革命基地，扬言要在春节前攻占遵义，春节后打入贵阳。被告人还允诺为赵普明提供枪支，亲笔写了一纸条派人去清镇一个同伙处取枪，并给赵犯出谋划策“派小分队潜入贵阳搞侦查，搞骚扰”，妄图杀害省的党政负责人。同年12月11日，被告人和赵普明等窜到织金县龙场区，当公安人员前去拘捕时，被告人拒捕被当场击伤，缉拿归案。

贵阳市中级法院根据被告人策划指挥专业武斗队，血腥镇压群众，以及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行，于1978年9月1日依法判处被告人康岩中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向贵州省法院提出上诉。省高院在二审过程中，审判人员本着认真负责态度，认真阅读案卷，多次提审被告人，与承办该案的公安局干警交换意见，深入群众调查，进一步查证和核实一审认定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证据确凿，完全属实。针对被告人的量刑问题，省高院还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同年10月9日，贵州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维持贵阳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

1978年，与被告人康岩中同期受到人民法院审判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反革命、打砸抢罪犯还有张德茂、杨世才、郁昌峰、袁昌福等。人民法院根据他们所犯罪行，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贵州省高院向全省发出布告，公布对这批罪犯的判处结果，并重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惩治反革命的一贯政策。为了扩大宣传教育效果，配合全省开展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省高院将以上罪犯押解到遵义等地进行巡回宣判。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法院成立特别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取得圆满的成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办案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贵州省高院按照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经验和方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贵州的骨干成员孙昌德、徐英年反革命案，进行了审理。

被告人孙昌德，1967年打着“造反”旗号，篡夺贵州日报社领导权和省的部分领导权，担任“贵州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进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常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被告人亲笔写了《关于贵阳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发展问题的决议》进行散发，煽动和支持省、市各单位群众组织“彻底夺权”。被告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时，诬陷工人徐永春、张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将徐、张2人逮捕判处徒刑。又以“抗议命令”为由，将许自华等4名工人拘留，关押达5个多月。被告人在贵阳接见铜

仁造反派头头时，在他的煽动下，致使铜仁县的武斗加剧，打死群众 21 人。被告人参与策划镇压贵州工学院师生员工的会议，调用电台，指挥镇压抓捕群众 200 余人，其中打伤 91 人，打死 1 人，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仪器。1968 年，被告人在铜仁诬陷干部何玉才、社员吴岱振、工人寥向、学生向昌玉是“坏头头”，亲自下令将 4 人抓起来关押 3 个多月。1969 年 7 月 29 日，贵阳发生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简称“7·29”事件），被告人参与了策划，提出了用武力解决的办法。在这次事件中有 55 人被打死，108 人被打伤。从 1974 年 3 月至 1976 年 4 月，被告人伙同徐英年等人，联名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的文章，印发《向右倾复辟思想开炮》的材料，捏造说：“贵州扼杀了新生事物，大搞复辟倒退”，“贵州有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把叛徒、特务搞上来了”。1976 年 8 月，被告人亲自组织写了《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布置（新贵州报）刊登，并强令贵州省广播电台广播，点名诬陷贵州工学院副院长达昭、教授熊胤笃，使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被告人徐英年，1967 年积极参与孙昌德等人策划夺取贵州省领导权的活动。1967 年 1 月，被告人在贵阳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大造“夺权”舆论，煽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权的问题”，“我们要夺权”，“凡有条件的都要夺权，条件不成熟的要创造条件”。夺权之后，被告人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8 年，被告人利用其夺取的权力，诬陷、诽谤原中共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是“大叛徒”，致使他们进一步遭到残酷迫害。被告人还参与指挥镇压安龙县龙广区群众的“龙广事件”，打死打伤群众 20 余人，之后又在兴义指使他人召开策划会议，组织武斗人员，攻打兴义县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大楼，打死群众 4 人。1974 年被告人为了进一步夺取省的领导权，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伙同孙昌德炮制出《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一文，制造新的动乱。

1982 年 11 月 27 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孙昌德、徐英年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向贵州省高院提起公诉。贵州省高院审查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认为起诉书指控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的规定。虽然两名被告人所犯罪行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布和实施之前，但是无论依照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还是依照 198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因此，贵州省高院决定受理本案，并认为这两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虽然是在刑法公布以前实施的，但应该依照刑法惩处。这是因为刑法第 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对于颠覆政府的反革命罪，过去的惩治反

革命条例规定了较重的刑罚，而刑法较过去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处刑较轻。所以，对本案两名被告人的判处应适用刑法。

贵州省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05 条和第 112 条规定，组成两个合议庭，于 1982 年 12 月 15 日至 21 日分别对孙昌德、徐英年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对被告人孙昌德的审判，由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张德华、刘起旺，审判员朱铭彬和人民陪审员罗绪先、卢程组成合议庭，张德华担任审判长。书记员宋战平、邓胜利担任记录。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思培、王安新、林林出庭支持公诉。贵阳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肖常纶、张文炎为其辩护人。对被告徐英年的审判，由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起旺、张德华，审判员朱铭彬和人民陪审员罗绪先、卢程组成合议庭，刘起旺担任审判长，书记员邓胜利、宋战平担任记录。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林、王安新、刘思培出庭支持公诉。贵阳市法律顾问处张文炎、肖常纶为其辩护人。

两个审判庭在审判中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在法庭调查中，听取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各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听取证人证言；听取部分被害人的陈述。在法庭辩论中听取公诉人的发言和辩护人的辩护。法庭还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表明法庭切实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决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在审判过程中，两个审判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严格审核证据，务求确凿、充分。法庭对两名被告人的每项罪行的认定，都是严肃、慎重的，坚持只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确凿的事实，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

根据已确认的事实，两个审判合议庭最后认定被告孙昌德、徐英年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2 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 101 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 102 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 138 条诬告陷害罪。两个审判合议庭根据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在事实面前供认罪行的态度，报请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0 条、第 92 条、第 101 条、第 102 条、第 138 条和第 52 条、第 64 条的规定，判处被告孙昌德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0 条、第 92 条、第 101 条、第 102 条、第 138 条和第 52 条、第 59 条第 2 款、第 64 条的规定，判处被告徐英年有期徒刑 6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宣判后，被告人孙昌德、徐英年，均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

1976 年，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历史，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须积极组织力量，各单位都要心中有底。另外，一定要设法搞枪”。
摘自×××的交代

研究室

摘自×××的交代

袁昌福在他召开的反革命应变会上作贼心虚地狂叫：“法西斯镇压马上就要到了，要不了几天大规模抓人了，那时要跑也跑不了啦”。他扬言：“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宁愿饿死在山上，也不愿意回来挨抓。”

摘自张甦的交代

康岩中在反革命应变会上恶毒攻击说：“搞修正主义没有好下场，肯定是不会长久的，主席逝世后，就看我们是不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时吼得凶，没有用，要在这关键时刻看一个人的表现，只要革命胜利，我愿当个垫脚石。”

摘自×××的交代

康岩中在反革命应变会上气急败坏地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被抓起来，就是没有掌握武器。只会写文章，被×××他们搞掉了。我们的斗争形式也要有所改变，不能再到处去贴大字报，围攻省委。现在是真枪实弹的时候了。要在骨干中做工作，右派政变啦，看来要重上井冈山，到农村去打游击。无非是掉脑袋，愿为王、张、江、姚他们作块奠基石。”

摘自康岩中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口供

康岩中狂叫：“走资派不会卖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

受冲击，他们怀恨在心，现在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制裁我们，据我知道，政法部门整人就很厉害。现在我们不能象过去靠写大字报，冲一冲，那已经没有用了，现在是真枪实弹的时候了。”

摘自杨世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供词

康岩中持枪上山为匪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杀气腾腾地叫嚣：“要进行散发传单，要搞一支精悍的骨干力量，到贵阳搞暗杀活动，主要是头头。要暗杀和传单同时进行，搞得他人心惶惶，叫×××过不到清静年。”

摘自陈光清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七日口供

赵福岭在反革命应变会上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后“从此，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诸侯割据，谁也管不了谁。这四个人在中央没有抓住兵权，力量那么强都被干掉了。搞掉这四个人，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从此，中国全面复辟，无产阶级政权落到修正主义手里，中国从此变修，右派翻天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赵福岭还胡说：“从此中国全面复辟，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重上井冈山，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四人（指四人帮）主要没有武装，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搞武装，现在先组织好，到时候，红旗一举上井冈山。”

摘自×××的交代

张应保在反革命应变会上恶毒攻击说：“右派翻天，我们只有组织起人民把他们打倒，你不组织，不发动，不搞武装，光拿脑袋去碰，找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改变了颜色，中国已出现了修